

日治時期學校登山活動

文／賴冠姘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、品冊有限公司專案經理）

日治時期，學校的體能教育最初主要為體操科，實施遊戲、普通體操，教授學生基礎運動知識與方法；另外，於課外時間安排其他得以增加學生體力的體能訓練、運動競賽等活動，包含遠足、游泳、弓道、球類運動及登山等。

各校自訂活動方針

日本政府對於學校的登山活動，未明文或硬性規定活動內容與次數，各校因應體能教育方針而各有不同，有些學校將登山作為全校性活動，有些則是由教職員帶領有意願的學生參加登山活動。登山活動的目的，除了增加體力、強身健體之外，也有教師利用登山進行地理、博物等學科的實地教學，指導學生採集標本、觀察生態。

學校單位的登山活動紀錄，最早始於1897年《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》中，記錄該校學生曾於1897至1899年暑假，攀登日本富士山，臺北近郊觀音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；之後，大屯山的積雪也帶動了學校的登山活動，促進學校的集體登山。明治時期，大屯山約有十次積雪的紀錄，日籍教師們往往藉此機會，帶領生活於熱帶地區從未見過雪的臺籍學生，上山實際觀雪，同時教授與雪相關的課程，對於學生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體驗。



▲臺北高等學校山岳部活動照片。（圖片出處／「能體善育：2020 臺師大體育特展」網頁）

由於明治時期屬日本殖民統治初期，治安較不穩定，高山地區仍存在「生蕃」威脅，故此時的登山活動以城市近郊海拔較低的山為主，直到1910年代「理蕃事業」告一段落後，登山活動方得以往高山發展，亦更為蓬勃。

山岳教材與登山社團

在課堂上，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的國語科、地理科等教科書中，收錄有介紹日本富士山，以及臺灣新高山、次高山、阿里山等高山的課文，臺灣教育會亦提供拍攝山景的照片與影片，作為補充教材。學生透過教材，認識由明治天皇命名的新高山，以樹立天皇於學生心目中的偉大形象，也藉此認識臺灣山岳環境。另外，登山活動所需的體能與耐寒訓練，亦能夠呼應殖民政府鍛鍊國民身體的目標，故學校在教導學生認識高

山的同時，鼓勵學生多參與登山活動。

大正年間起，中等以上學校紛紛在「校友會」組織下設置登山部門（社團）。校友會由校長擔任會長，校內教職員擔任部長以輔導社團組織，其下設有各式各樣的部門。例如臺北帝國大學、臺北高等學校，以及各地的專門學校、師範學校、中學校、女學校等皆設有登山部門；例如，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（今建國中學）麗正會「登山部」、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（今北一女中）校友會「徒步部」等，積極舉辦各種登山活動。

登山活動的地點，除了都市近郊海拔較低的山外，高山部分以新高山（玉山）、次高山（雪山）、能高越嶺為主；活動時間根據各校自行出版的「學校一覽表」，多利用暑假期間辦理。

登山成果與學術踏查

學校登山活動實施的成果，在現存紀錄中，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不僅早在1916年就設立登山部門，也是較早開始



▲彰化高女新高山登頂照，年代不詳。（圖片提供／彰化女中）

攀登高山的學校；除登新高山外，更曾攀登南湖大山、大霸尖山、中央尖山、奇萊主山北峰、合歡山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中可見到連載式報導，該校麗正會雜誌《麗正》中，也可見到學生撰寫登山經歷與心得。

此外，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的登山成果也相當豐碩。該校經常於夏季及冬季舉辦多天縱走行程，除臺灣境內的高山外，更曾攀登日本阿爾卑斯山、九州諸峰等高山。該校山岳部部長為博物科教授河南宏（1896-1941），他是東京帝國大學植物科理學士，在臺北高校任職期間（1928-1941），曾多次參與臺灣山岳會所舉辦的學術標本採集登山，在校內也多次指導學生登山，同時進行博物採集，幫助山岳部蓬勃發展。

臺北高等學校第一屆高等科學生鹿野忠雄（1906-1945），在學期間（1925-1929），大部分時間都於臺灣山林中進行昆蟲採集、原住民族研究，並發表六十篇以上學術著作，為著名的登山家、博物學者。由於鹿野忠雄熱衷登山與研究，導致上課時數不足，差點遭到退學，最終在校長三澤糾愛惜人才的考量下，留級一年後才畢業。

鹿野忠雄發表多篇與臺灣高山地形、生態，以及原住民相關的研究，更是發現臺灣冰河地形的第一人；1941年，他將攀登臺灣高山（包含新高山、秀姑巒山、阿里山等）的紀錄，集結為《山と雲と蕃人と：台湾高山行（山、



▲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校友林蔡婉提供之七星山登山合照。（陳皇志攝於中山女中校史室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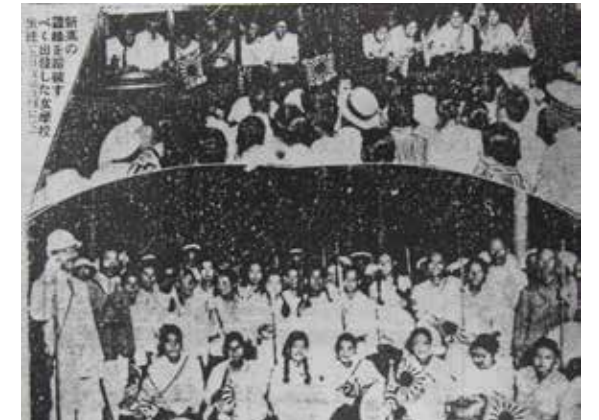
雲與蕃人：臺灣高山紀行）》，為日治時期的臺灣高山生態留下珍貴紀錄。

女子學校登山活動

除了男學生之外，女學生亦開始參與登山活動。現存紀錄中，最早為1917年臺北高等小學校（今福星國小）160名女學生，在教職員帶領下前往草山進行郊外教學。之後，彰化高等女學校（今彰化女中）、臺南高等女學校（今臺南女中），以及臺北第一、二（今北一女中）和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（今中山女中）等學校，紛紛舉辦攀登新高山活動。

臺籍女學生的登山活動亦相當興盛。在清代社會，女性有纏足風俗，使得女性的活動能力與範圍皆相當有限。日治初期，總督府對於臺籍女性身體的塑造，第一步即為「放足」，大正年間，放足運動在公權力介入下，獲得良好成果，學校女子體育活動因而獲得相當進展。

舉例而言，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



▲臺北第一、第二高女學生登玉山前在臺北車站集合，學校師長均來送行。（圖片出處／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6年）

於1927年舉辦首屆攀登新高山活動。根據校友林蔡婉回憶，此次登山並非全校性活動，而是有意願的學生報名參加，報名者須為成績優良、品行端正，經校醫嚴格檢查無其他疾病後，尚須通過體能測驗，出發前一個月須再進行體能訓練，最終僅有十餘名女學生，在教職員、警察、原住民的協助下成功登頂。此次登山活動被拍攝成紀錄片，並舉辦「新高登山展覽會」，向民眾展現臺灣女性的體力與耐力，之後成為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每年的例行活動，直到1943年才停辦。

日治時期的學校登山活動，除實地教學外，更著重鍛鍊學生的體魄與修鍊學生的精神，以形塑具有日本國民性格的身體；同時，作為新奇且趣味的課外活動，在學生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參考文獻：林玫君，〈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〉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3年。